

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区域经济的分割^{*}

陆 铭 陈 钊 严 冀

(复旦大学就业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经济系 200433)

内容提要:本文考察了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以促使落后地区加入分工体系,这时,财政转移就兼有了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

关键词:区域分工 重复建设 收益递增 财政转移

一、引言

区域经济的同构、分割以及地方保护主义本质上是地区之间不进行分工的现象,那么,市场化改革以来这些现象为什么会在我国持续地存在?本文认为,恰恰是因为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地区间分配分工收益的方式,使得落后地区在分工收益中的所得份额相对缩小,于是就使得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有激励独立自主地发展一些在短期内并无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业,以期提高自身在未来分享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威胁点)。而这种地方政府的理性行为所导致的结果恰恰是一轮又一轮的重复建设。在上一世纪 80 和 90 年代出现的两轮重复建设分别是以家用电器和汽车为代表的,而 2000 年以来的“第三次重复建设”则主要表现为各地都在争着上一些开发区,很多地方将建设电子信息、新材料和生物医药工程作为自己的战略,而这又为新一轮区域经济的分割埋下了隐患。

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独立自主”倾向必然导致市场的分割或者“非一体化”,Young(2000)的论文发现,近 20 年来大部分的省份无论在 GDP 的结构、制造业的产出结构或是重要产品的资本边际产出等方面都存在着收敛的趋势,他认为是中国的分权化导致了地方官员控制下的“零碎分割的区域市场”。Naughton(1999)对这种观点提出了两点置疑:首先,中国各地方生产结构的趋同可能是快速的工业化进程本身造成的;第二,区域生产结构的变化有可能意味着中国正在逐步摆脱原有的不合理的区域分工。通过直接比较 1987 年和 1992 年中国省际工业品的贸易流量,Naughton 发现这个量不仅有了明显增长,而且制造业内部各行业间的贸易占据了主导地位,表现出中国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许心鹏(Xu, 2002)主张用商业周期模型来综合地检验中国省际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他的研究表明,虽然在短期内各省的影响可以解释 35% 的省际真实产出的变动,但是在长期内部门特定的影响成为产出波动的主要因素。这个结果意味着,中国区域市场一体化尽管还不充分,但正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Batisse(2002)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短期存在较强的省际影响。同时她还发现,在中国的工业中多样化的格局更有利于地区工业的发展,而专业化的发展模式(Mar 型外部性)却

^{*} 本文系 2003 年 11 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入选论文的修改稿。作者感谢论坛参加者以及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研讨会的参加者的评论,作者感谢复旦大学文科科研“金苗计划”的资助。

《文汇报》2003 年 6 月 20 日和魏后凯(2001)提供了有关中国重复建设现象的描述。

对地区的工业增长有着负面的作用。

与此同时,认为中国市场存在“非一体化”倾向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Poncet (2002) 测算了中国国内市场间的“边界效应”,结果表明,在 1987 年到 1997 年期间,中国国内的省际边界效应上升了,中国省际之间的市场一体化水平已经低于欧盟国家之间的一体化水平。她认为,中国国内市场的分割根源于自给自足的倾向(尤其是在内地省份)。郑毓盛和李崇高(2003)的研究将中国宏观技术效率分解为省内的技术效率、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及省际要素配置效率,他们发现,自改革以来省内技术效率已经有所提高,而产出结构的配置效率和省际要素配置效率却有所恶化,这项研究也为地方分割的负面影响提供了证据。Bai *et al.* (2002) 的实证研究表明地方保护主义明显存在。但是从长期来看,区域专业化的趋势经历了短暂的逆转后,在最近几年有了长足的发展。

那么,市场分割的根源是什么?一种较为直观的解释是地方政府为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本地劳动力的就业,但这种解释不可能说明问题的全部甚至主要部分,原因有两点:第一,暂时的保护的确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和保护就业,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那么对其进行保护的代价在市场机制下将越来越大,从而不可能使得地方政府对其进行持久的保护。第二,在现实中,地方的保护主义或重复建设并不一定表现为对已有企业的保护,而往往表现为对一些新兴的或成长中的产业的保护,这些产业在发展的初期可能需要政府进行大量的投入,还不能为地方创造收入甚至就业。

另一种替代的直观解释是,地方政府是出于政绩的考虑而采取保护主义的措施的。但是从实证结果来看,如果地区的经济发展偏离了其比较优势,那么,其经济增长将受到负面的影响(林毅夫、刘培林,2003)。既然如此,为什么地方政府还是那样热衷于对一些产业采取扶持性的政策呢?

第三种相关的解释是将中国放在一个国际经济的环境里来看问题。由于中国越来越多地融入了全球经济,如果相对于全球经济而言,中国各地区具有相同或相近的比较优势,那么,各地区之间的产业结构趋同就成了合理现象。这虽然能够解释地区间的产业同构和地区间贸易的下降(Poncet, 2001, 2002),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要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此外,我们很难相信,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地区间在技术、资源、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各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在全球环境下是相同或相近的。

本文将从理论上考察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我们认为,改革以来财政的分权和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是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的深层次原因。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收益分配的谈判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同时却将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中央政府向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就可以促使其加入分工体系,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时,财政转移就兼有了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

本文是这样组织的:第二节是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将用一个简洁的两期模型来研究地方政府的分工决策,其中,我们将考虑产业发展中的收益递增性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并由此解释政府的战略性决策所导致的区域分工的低效率现象。第三节中考虑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对区域分工的促进作用。最后一节是结论及相应的政策含义。

一个更为完整的有关财政分权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的综述请参见严冀、陆铭(2003)。

二、收益递增、发展战略与重复建设:一个跨期分工决策模型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考虑地方政府的跨期分工决策。地方政府的跨期决策可以被认为是当地居民长期利益的一种考虑,对于地方政府发展那些还不能创造税收和就业的战略性产业的行为,用长期的经济目标来理解是比较合理的。而且,只要存在政策的一致性,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就不会随着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更替而发生变化,这就可能使地方政府认为自己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获得地方发展战略带来的正面效应。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假设有两个地区,其中,落后地区当前的比较优势是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产品,而另一地区相对发达,其当前的比较优势是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产品。在博弈的第 0 期,模型中关键的参数被博弈双方发现,这些关键参数包括发达地区的相对技术进步速度 ϕ 和高技术产业的初始技术水平 A ,对这两个的参数含义我们将在后文中加以解释。在模型的第 1 期,双方或者选择分工,或者选择不分工。然而在第 2 期,由于在单期决策中双方按照比较优势进行分工一定是对双方有利的,所以分工一定比不分工好。于是,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所要比较的只是第 1 期分工或不分工,而第 2 期一定分工时博弈参与者的效用水平。在下文中,当分析发达地区的情况时,我们为变量加上上标“ $*$ ”。为了模型求解的方便,我们假设两个地区的即期的效用写作 $U = C^l \cdot C^h$, 其中, C^l 表示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的消费, C^h 表示技术含量较高的商品的消费。

2.1 独立自主 (autarky) 的状态

我们考虑一个地区在第 1 期和第 2 期内的跨期决策,相应的变量分别用下标 1、2 表示,每个地区跨期效用 (U) 最大化的规划为:

$$\text{Max}_{L_1, L_2} U = C_1^l \cdot C_1^h + C_2^l \cdot C_2^h$$

其中,政府要决策的是两期中分别投入多少劳动力在高技术产业(即 L_1 和 L_2)。进一步地,假设每个地区的劳动力总数为 2,这个劳动力总数减去高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就是低技术产业中的劳动力投入。这一规划的约束条件是两种商品在两期中的生产函数,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被假设为线性的,并且只有劳动一种投入。我们用小写字母表示与技术含量较低的商品有关的变量,于是两期两种商品共 4 个生产函数可以写作:

$$\begin{aligned} y_1 &= a_1(2 - L_1) \\ Y_1 &= A_1 L_1 \\ y_2 &= a_2(2 - L_2) = a_1(2 - L_2) \\ Y_2 &= A_2 L_2 = 2\phi A_1 L_2 \end{aligned}$$

其中,我们用 Y (或 y) 表示产量,这些产量全部转化为相应的消费 C 。我们用 A (或 a) 表示技术水平,在以上式子中,我们实际上假设了低技术商品的生产没有人力资本积累的效应,两期里的技术水平是一样的(即 $a_2 = a_1$),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中有入力资本积累效应和收益递增性,其中,技术进步的形式是:

$$A_2 = 2\phi A_1$$

也就是说,第 2 期的技术水平与第 1 期的劳动力使用数量线性正相关, ϕ ($\phi > 0$) 是一个表示技术进步速度的外生参数,与制度环境、劳动力的勤劳程度、劳动力的教育程度等外生因素有关。引入技术进步速度参数是为了在模型中可以考虑贸易理论中的动态比较优势效应 (Redding, 1999)。将上述四个生产函数代入最优规划,可以求出模型的解:

这个效用函数可以被看作是柯布 - 道格拉斯形式的效用函数的简化形式。

$$L_1 = 1 + \phi \text{ 和 } L_2 = 1$$

这一结论可以总结为命题 1:

命题 1:在跨期决策中,由于在一个产业里存在着由收益递增所带来的技术进步,于是,这个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当期的劳动力投入越多。劳动力配置与初始技术水平无关。

当两期的劳动力配置都决定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算出独立自主时的一个地区的跨期总效用:

$$U = a_1(2 - 1 - \phi) \cdot A_1(1 + \phi) + a_1 \cdot 2\phi(1 + \phi) \cdot A_1 = a_1 A_1(1 + \phi)^2$$

为了进一步简化分析,我们不失一般性地设落后地区在两个产业中的初始技术水平和高技术产业中的技术进步速度均为 1,发达地区 $a_1^* = 1, A_1^* = A, \phi^* = \phi$,则完全独立自主(不分工)情况下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效用分别是:

$$U_0 = 4 \text{ 和}$$

$$U_0^* = A(1 + \phi)^2$$

2.2 考虑按静态比较优势完全分工的状态

不难计算出按照静态比较优势进行分工的状态下两个地区的产量,同时我们可以分别用 α_i 和 $\beta_i (i = 1, 2)$ 表示落后地区第 i 期在低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中所获得的份额(见表 1)。

表 1 完全分工下的产量与分配比例

		第 1 期		第 2 期	
		低技术	高技术	低技术	高技术
产量	落后地区	2	0	2	0
	发达地区	0	2A	0	$2\phi \cdot 2 \cdot A \cdot 2 = 8\phi A$
分配比例	落后地区	α_1	β_1	α_2	β_2
	发达地区	$1 - \alpha_1$	$1 - \beta_1$	$1 - \alpha_2$	$1 - \beta_2$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政府曾经用行政手段来实现地区间收入的均等化。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央政府不再能够通过行政性的手段来实现地区间收入的完全均等化了。我们用纳什谈判解来刻画转轨时期分工收益的分配机制,在这一分配方式下,两个地区的威胁点是他们各自在独立自主下所获得的效用,于是这一规划可以写作:

$$\max_{\alpha_1, \beta_1, \alpha_2, \beta_2} H = [U - U_0] \cdot [U^* - U_0^*] = [2\alpha_1 \cdot 2\beta_1 \cdot A + 2\alpha_2 \cdot \beta_2 \cdot 8\phi A - 4]$$

$$\cdot [2(1 - \alpha_1) \cdot 2(1 - \beta_1) \cdot A + 2(1 - \alpha_2) \cdot (1 - \beta_2) \cdot 8\phi A - A(1 + \phi)^2]$$

根据模型的一阶条件可以看到,落后地区在两个时期里两种产品上所获得的份额都是相同的,即:

$$\alpha_1 = \beta_1 = \alpha_2 = \beta_2 = s$$

将其代入模型的一阶条件,可得:

$$(1 - 2s)(4 + 16\phi)A - \frac{A(1 + \phi)^2}{(1 - s)} + \frac{4}{s} = 0$$

可见,分配份额取决于模型中的两个关键的参数,即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中的初始技术水平 A 和技术进步速度 ϕ ,正是这两个参数决定了谈判双方的威胁点。不难看出,当 $\phi = A = 1$ 时,双方并没有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的差异,双方的威胁点是一样的,这时 $s = \frac{1}{2}$,即双方将对所有产品进行平均分配。我们感兴趣的是,当发达地区具有在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A > 1$),且技术进步

这里,我们对威胁点的定义是双方独立自主时的效用,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双方不能达成协议时的效用。通常,在纳什议价方法中威胁点被定义为博弈过程中的所得,而不是外部市场上的所得。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可以参见陆铭(2004)。

速度也较快时($\phi > 1$)时,双方的产品是如何分配的?为了获得这一比较静态解,我们运用 *Matlab* 对谈判解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落后地区在谈判解下所获得的产品份额是与发达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负相关的。上述结果可以总结为命题 2。

命题 2:在纳什谈判解下,产品分配不再平均。在高新技术产业拥有初始比较优势的一方将获得更大的商品份额,而且它在产品分配中所获得的份额是与它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速度正相关的。

由于计划经济年代实行了地区均等化的政策,而市场化改革改变了原计划经济体制下产品在地区间平均分配的模式,可能导致了地区间的不均等。

2.3 第 1 期不分工的情况

在两个地区进行分工时,如果第 1 期不进行分工的话,那么,一种替代性的可能是第 1 期先独立自主,第 2 期再分工。由于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具有收益递增性,所以在第 1 期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就可能在第 2 期获得更高的收益,这来源于两个方面:(1)因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收益递增性,第 2 期进行分工收益分配的谈判时落后地区的威胁点(独立自主时的效用)提高了,于是在产品分配中可以获得更高的份额,(2)同样是因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收益递增性,在经过第 1 期的独立自主的发展之后,甚至可能在第 2 期出现比较优势的逆转,这一效应类似于 Redding (1999)所说的国际贸易中的动态比较优势。但是,上述两种效应却是以放弃第 1 期分工的收益为代价的,于是,是否落后地区会选择在第 1 期不分工,就要通过比较第 1 期分工或不分工给落后地区带来的效用来决定了。

如果在第 1 期两个地区都独立自主,则各有 1 单位劳动投入两个产业,两个地区所获得的效用分别为 1 和 A (见表 2)。如果两个地区在第 2 期继续独立自主,那么仍然各有 1 单位劳动投入两个产业,两个地区所获得的效用分别为 2 和 2ϕ (见表 3),这种情况下的效用构成了第 2 期进行纳什谈判的威胁点。

表 2 第 1 期独立自主的产量与效用

	产量		效用
	低技术	高技术	
落后地区	1	1	1
发达地区	1	A	A

表 3 第 2 期独立自主的产量与效用

	产量		效用
	低技术	高技术	
落后地区	1	2	2
发达地区	1	2ϕ	2ϕ

表 4 第 2 期比较优势不变时的产量与分配

		低技术	高技术
	落后地区	2	0
产量	发达地区	0	4ϕ
	落后地区	α	β
分配比例	发达地区	$1 - \alpha$	$1 - \beta$

在两个地区第 1 期不进行分工的情况下,到了第 2 期,理论上可能会出现比较优势逆转的情况(如果落后地区的外生的技术进步速度足够快,在模型中体现为发达地区的 ϕ 足够小),所以,对第 2 期分工的状态我们必须区分比较优势得以保持和比较优势被逆转两种情况来讨论。

2.3.1 第 1 期的比较优势在第 2 期仍然得以保持的情况($2\phi > 2$)

由于第 2 期的分工决策是一个静态的决策,所以双方一定选择按照第 2 期的比较优势来进行

研究中国地区间收入差距趋势与成因的文献非常多,与我们的解释相类似的是,有研究认为改革以来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是更加倾向于较发达地区的,因而不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Raiser, 1998;马拴友、于红霞,2003)。对本文模型的数值模拟的结果显示,在由计划经济的平均分配转向市场经济的谈判解的过程中,地区间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初始技术水平差距越大、较发达地区在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越快,相对落后地区损失的效用越多,而发达地区得到的效用增量则越大。

完全的分工。表 4 给出了第 2 期完全分工的产量和假设的分配比例。

第 2 期的产品分配比例是通过下面这样一个纳什谈判解来决定的,其中,双方的威胁点就是各自在第 2 期仍然独立自主情况下所获得的效用。

$$\begin{aligned} \max_{\alpha, \beta} H = [U - U_0] \cdot [U^* - U_0^*] = [2\alpha \cdot \beta \cdot 4\phi A - 2] \\ \cdot [2(1 - \alpha) \cdot (1 - \beta) \cdot 4\phi A - 2\phi A] \end{aligned}$$

根据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alpha = \beta = s$$

于是,可以解得:

$$(4 - 8s)\phi A - \frac{\phi A}{(1 - s)} + \frac{1}{s} = 0$$

2.3.2 第 2 期的比较优势被扭转的情况 ($2\phi A < 2$)

类似地,我们也可以表 5 列出当第 2 期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时两个地区在第 2 期完全分工时各自的产量和分配比例:

这里产品分配比例仍然得自于纳什谈判解:

$$\max_{\alpha, \beta} H = [U - U_0] \cdot [U^* - U_0^*] = [2\alpha \cdot 4\beta - 2] \cdot [2(1 - \alpha) \cdot 4(1 - \beta) - 2\phi A]$$

同样根据一阶条件,可以得到:

$$\alpha = \beta = s$$

于是,可以解得:

$$(4 - 8s) - \frac{\phi A}{(1 - s)} + \frac{1}{s} = 0$$

表 5 第 2 期比较优势逆转时的产量与分配

		低技术	高技术
产量	落后地区	2	0
	发达地区	2	0
分配比例	落后地区	α	β
	发达地区	$1 - \alpha$	$1 - \beta$

2.4 不同分工状态下的效用比较的数值模拟

在上述模型中,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分工还是不分工,要看两种选择下落后地区所获得的效用水平如何,这就需要对上述模型中不同的分工状态下的地区效用水平进行求解,但由于上述模型无法解出一个分配比例 s 的解析解,所以我们只能借助于数值模拟的方法来对不同分工状态下的效用水平进行比较。

在利用 Matlab 进行数值模拟时,我们先设定 A 的值,看两个地区在不同分工状态下的效用差如何随着 ϕ 的变化而变化,然后再改变 A 的值,看表示效用差的曲线将如何变化。对于不同状态下的效用差的比较静态分析的数值模拟结果见图 1。

图 1 的上面两张图模拟了在市场谈判解之下第 1 期不分工和第 1 期完全分工的效用差,即用第 1 期不分工情况下的两期的总效用减去两期都分工时的总效用,纵轴表示上述效用差,横轴表示发达地区的技术进步速度 ϕ 。我们发现,用“+”表示的落后地区的效用差的图形是一条 U 型的曲线,其最低点就是比较优势发生逆转时的临界状态(即 $2\phi A = 2$)。我们先来看这个临界状态右边比较优势得以保持的状态,不难发现,较发达地区在不分工状态下总是存在效用损失的,而且就某一个给定的 A 而言,随着 ϕ 的上升,发达地区在不分工状态下的效用损失越来越大。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在一个给定的 A 之下,如果 ϕ 不太高,这时,不分工的结果也是造成效用损失,但是,随着 ϕ 的上升,第 1 期不分工给落后地区带来的效用总和将超过第 1 期分工所带来的效用。那么为什

实际上这时由于比较优势发生的逆转,第 1 期的落后地区已经变成了发达地区。

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在给定的 A 之下, ϕ 的上升使得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中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强化,也意味着较发达地区在第 2 期进行分工收益分配谈判的时候获得了更高的威胁点,从而可以获得更多的产品份额,因此,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如果在第 1 期选择不分工,那么它将损失第 1 期分工的收益,但是它却在第 2 期获得了更高的威胁点,从而得到了更多的产品份额,其中的机制是,一方面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不分工使其获得了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当落后地区选择不分工时发达地区也只能选择不分工,于是也部分地失去了在高技术产业里的技术进步效应,从而在第 2 期的谈判地位相对下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效应并不是由于动态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即使比较优势不发生逆转,落后地区也会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激励在第 1 期选择不分工,以在第 2 期获得更多份额的分工收益。比较图 1 上方的两张图可以看出,对于一个更高的 A 值,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不分工的总收益超过第 1 期选择分工的总收益的临界点所对应的 ϕ 更低(见点划线对应的临界点位置)。尽管从落后地区的角度来看,第 1 期选择不分工完全可能成为理性的选择,但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第 1 期不分工的话,发达地区的效用损失要远远超过落后地区的效用所得,而且,不分工也造成了社会总产出的损失,所以,第 1 期不分工这一选择不是社会最优的选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感觉到区域分工的低效率普遍存在着,但却始终难以纠正。上述数值模拟分析可以总结为:

命题 3 由于可以在高技术产业获得技术进步,落后地区可能通过第 1 期不分工来提高第 2 期谈判中的威胁点,从而获得更高份额的分工收益。发达地区初始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进步速度越快,落后地区通过暂时不分工而争取更高的分工收益的激励越大。在一定条件下,落后地区在第 1 期不分工可能是理性的,但却不是社会最优的。

我们所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在地方的发展战略作用下,扭转比较优势的效应存在吗?在图 1 的上面两张图中,当 A 与 ϕ 的乘积为 1 时,是比较优势发生逆转的临界点,随着 ϕ 的下降,落后地区第 2 期中在高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越明显,最终,比较优势逆转的效应也将使第 1 期不分工成为理性选择。当然,这种在理论上存在的情况在现实中是很难出现的。

三、中央财政转移作为提高区域分工效率的机制

如果中央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来将区域分工的收益转移一部分给落后地区,是否可能使得落后地区参与到第 1 期的分工中来,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在上述分析框架内引入了政府的财政转移。我们所考虑的机制是先让两个地区通过谈判机制来决定双方在分工收益中的所得,并选择区域分工的状态,之后,再由中央政府出面将一部分收益由较发达地区转移到较落后地区。我们设这一笔财政转移是 t ,为了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展现两个地区在不同分工状态之下的效用比较,设 $t=3$,数值模拟的结果见图 1。

图 1 中的 $(a-1)$ 和 $(b-1)$ 分别表示在 $A=2$ 和 $A=1.01$ 时第 1 期不分工和第 1 期分工的总效用差。图 1 的 $(a-2)$ 和 $(b-2)$ 分别表示在 $t=3$ 的情况下, $A=2$ 和 $A=1.01$ 时第 1 期不分工和第 1 期分工的总效用差。通过比较这些图我们发现,引入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后,对应于一个特定的 ϕ ,第 1 期不分工的损失更大了。在某个特定的 ϕ 的区间内,引入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能使得落后地区在第 1 期便选择分工。当 $\phi=7$ 时(见虚线位置),如果 $A=1.01$, $t=3$ 已经足以使得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分工,而当 $A=2$ 时, $t=3$ 却仍不足以使得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分工。相类似地,给定 $A=1.01$,如果 $\phi=6$, $t=3$ 就足以使得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分工,但如果 $\phi=8$, $t=3$ 就不足以使得落后地区在第 1 期选择分工了。

显然,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以增加落后地区在分工收益中的所得,使其参与到第 1 期的分工中去。而对于较发达地区而言,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虽然使得它失去了一些潜在的分工收

益,但是却使得分工得以实现,而这也恰恰是发达地区想要看到的结果。所以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完全可能成为一种促进区域分工的机制,这对于全社会而言也是有利的。

命题 4 如果中央政府可以承诺对落后地区进行财政转移,让其分享更多的分工收益,那么就可能促进地区间的分工,提高社会总产出。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的初始比较优势越强、其技术进步速度越快,促使落后地区在第 1 期便选择加入分工体系的财政转移就应该越高。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具有促进区域分工的资源配置效应。

根据我们的分析,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应该更多地给予落后地区,这种财政转移的直接效应是缩小地区间的经济差距,而更为重要的效应则是促使较落后地区加入到全国的分工体系中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是将转移支付不加区分地给了每个地区,甚至给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更多,那么这样的转移支付不仅不能缩小地区差距,反而会加大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马拴友、于红霞,2003);Wong and Bhattasali,2003)。

四、结论及政策含义

本文考察了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在经济转型时期,地区间对于分工收益的分配不再可能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平均分配制度,而是转为由市场体制下的谈判机制来分配分工所带来的收益,由于较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在收益分配中占据了更高的谈判地位,从而在分工收益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而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如果它选择加入区域分工体系,只能分享分工收益的较少的部分。相反,如果落后地区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的话,那么虽然它将丧失短期内的分工收益,但却由此发展了高技术产业,提高了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同时,当落后地区选择不分工时发达地区也只能选择不分工,并部分地放弃在高技术产业的技术进步,相对降低了自己在未来的谈判地位。两相权衡,有可能短期内选择不分工对落后地区更为有利。而且,发达地区初始技术水平越高、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其谈判地位越高,在分工的收益中占有的份额越大,于是对于落后地区而言,就更加有激励去通过发展一些战略性的产业来提升自己未来的谈判地位。落后地区暂时选择不加入分工体系虽然可能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品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此外,我们还发现,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不仅可以使得落后地区获得更高的收入,而且也可以促使其加入分工体系,放弃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这就体现出了中央政府财政转移的资源配置功能。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可以提出两点促进区域分工的政策建议。第一,通过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实施向落后地区倾斜的政策,提高落后地区的收入,促使其加入全国的分工体系。根据本文的分析,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应该与不同地区之间的技术差距和技术进步速度正相关。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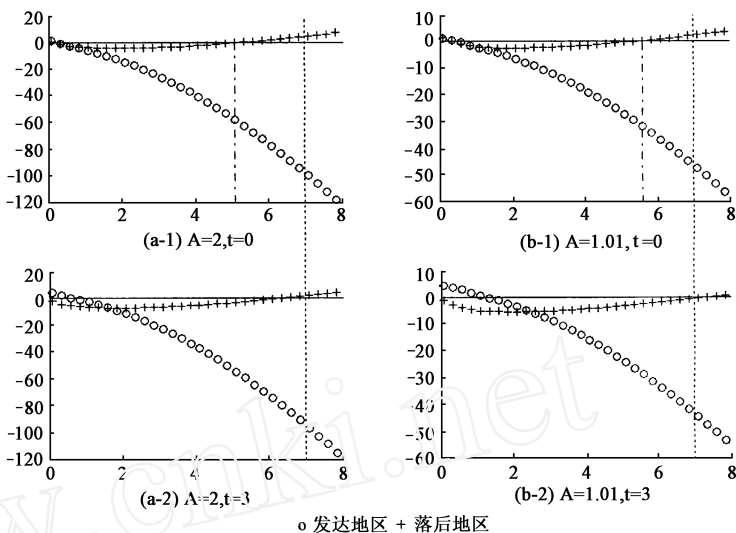


图 1 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对分工的影响

地方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制度性根源在于中国的投资体制中地方政府有相当大的能力进行投资,而且地方政府下属的计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地方政府投资的方向,因此,中央政府应该下决心取消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计划,改革投资体制,让地方政府从产业投资中退出来。大量的实证研究表明,基础设施的投资和教育的发展有利于缩小中国地区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例如 Dénurger, 2001; Dénurger, et al., 2002),因此中央财政转移(包括投往西部的财政支出)和地方的财政支出都应投资于基础设施和教育,而不应直接用于生产性投资。

对于成功的经济转型来说,分权必须适度,如果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采取高度的分权,就为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政策创造了条件,从而降低区域分工的效率,这种看法对既有的分权理论和联邦主义(federalism)理论构成了补充。既有的分权理论和联邦主义理论主要考虑了分权的收益。哈耶克(Hayek, 1945)指出,由于地方政府和消费者对地方的情况和偏好有更加完备的信息,因此,他们可以做出更好的决策。Tiebout (1956)认为,权力的竞争使得民众可以对自己进行分类,然后与一系列特定的地方性公共物品相匹配。钱颖一等人(Qian and Weingast, 1997)提出的第二代的分权理论认为,正如经理并不必然追求股东的利益一样,政府官员也并不一定追求民众的利益,但是在一个适当分权的政治结构下,如果能够对政府官员的绩效实施正的激励,并对其错误实施惩罚,那么,就可以激励地方政府官员承担风险和努力工作。此外,在分权的政治结构下,地方政府的相互竞争也构成了对他们的约束机制。地方政府在财政方面的竞争可以作为一种承诺机制,有效地避免低效率的政府支出(Qian and Roland, 1998)。如果分权具有上述的好处,那么中央政府是否就应该退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呢?本文的一个理论含义是,完全的分权可能促使地方之间采取动态的策略来进行地区间的分工决策,并采取保护主义的政策来发展地区经济,而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则可能作为一种承诺来促使较落后地区参与到分工体系中去,因此,适度的集权有利于提高分工的效率。那么,中国的财政体制是否处在适当的分权状态呢?简单以地方财政支出占全部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中国的这一指标非常高,显示出中国是非常分权的(Jin, Qian, and Weingast, 2001, 严冀、陆铭,2003)。Zhang and Zou (1998)的研究结果是,中国的财政分权并不利于经济增长。虽然本文指出不恰当的分权可能是导致地区经济分割的原因所在,我们却并不简单地主张提高中央财政的比重,重要的是财政支出的方向。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集权的结果是加剧了地方政府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的行为转变,抑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陈抗等, 2002)。因此,所谓“最优”的分权结构除了适当的财政集权之外,还需要一系列制度来规范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且使中央的财政转移更加向落后地区倾斜。

参考文献

- 陈抗, Arye L. Hillman, 顾清扬, 2002, 《财政集权与地方政府行为变化——从援助之手到攫取之手》, 《经济学(季刊)》, 第2卷第1期, 111—130页。
- 林毅夫、刘培林, 2003, 《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与地区收入差距》, 《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19—25页。
- 陆铭, 2004, 《工资和就业的议价: 理论及中国二元就业体制的效率考察》, 上海人民出版社。
- 马拴友、于红霞, 2003, 《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 《经济研究》2003年第3期, 26—33页。
- 魏后凯(主编), 2001, 《从重复建设走向有序竞争——中国工业重复建设与跨地区资产重组研究》, 北京: 人民出版社。
- 严冀、陆铭, 2003, 《分权与区域经济发展: 面向一个最优分权程度的理论》, 《世界经济文汇》, 第3期, 55—66页。
- 郑毓盛、李崇高, 2003, 《中国地方分割的效率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第1期, 64—72页。
- Bai, Chong-En, Yingjuan Du, Zhigang Tao, and Sarah Y. Tong, 2002, “Protection and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Evidence from China's Industries,” Working Paper, Feb. 2002.

Blanchard 和 Shleifer (2000) 认为, 联邦主义必须以一定程度的集权为效率的保证, 否则就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采取一些保护地方利益的政策。Qian and Roland (1998) 也指出过, 联邦体制会引起地区间的竞争, 从而导致地区间投资的扭曲。

- Batisse, Cécile, 2002, 《专门化、多样化和中国地区工业产业增长的关系》,《世界经济文汇》2002 年第 4 期, 49—62 页。
- Blanchard, Oliver, and Andrei Shleifer, 2000,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7616, <http://www.nber.org/papers/w7616>, March 2000.
- Déurger, Sylvie, 2001,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 95—117.
- Déurger, Sylvie, Sachs J. D., WingThye Woo, Shuming Bao, Gene Chang, and Andrew Mellinger, 2002, "Geography, Economic Polic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46—205.
- Hayek, Friedrich A., 1945,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35, 519—530.
- Jin, Hehui, Yingyi Qian, and B. R. Weingast, 2001,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mimeo.
- Naughton, B., 1999, "How Much Can Regional Integration Do to Unify China's Markets?" Conference for Research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cy Research, Stanford University.
- Poncet, Sandra, 2002, 《中国市场正在走向“非一体化”吗? ——中国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程度的比较分析》,《世界经济文汇》第 1 期, 3—17 页。
- Qian, Yingyi and Barry R. Weingast, 1997,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Vol. 11, No. 4, 83—92.
- Qian, Yingyi and Gérard Roland, 1998, "Federalism and the Soft Budget Constrai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88(5), 1143—1162.
- Raiser, M., 1998, "Subsidising Inequality: Economic Reforms, Fiscal Transfers and Convergence across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34(3), 1—26.
- Redding, Stephen, 1999, "Dynam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Welfare Effects of Trade," *Oxford Economic Paper*, 51, 15—39.
- Tiebout, Charles, 1956,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64, 416—426.
- Wong, Christine P. W., and Deepak Bhattasali, 2003,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Sub-national Financ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 The World Bank. (中译本,《中国:国家发展与地方财政》,中信出版社 2003 年版。)
- Xu, Xinpeng, 2002, "Have the Chinese Provinces Become Integrated under Reform?" *China Economic Review*, 13, 116—133.
- Young, Alwyn,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 CXV, 1091—1135.
- Zhang, T. and H. Zou, 1998,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Public Spending,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67, 221—240.

Increasing Retur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Regional Economic Segmentation

Lu Ming, Chen Zhao & Yan Ji
(Fud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explored the causes of duplicative industries and interregional economic segmentation with increasing return. In a market economy, the better-developed region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higher speed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consequently a higher position and a larger share in interregional bargaining to distribute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If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 does not specialize, it will lose the benefits of regional specialization, but it might also gain a higher bargaining power in the future and even catch up the rich region. The higher is the technological level of better-developed region, the higher is its speed of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e higher is its bargaining power, and the more beneficial is it for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 to raise its bargaining power by develop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Though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t's self-beneficial for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 to behave strategically, it's socially inefficient because of loss in total production and allocative efficiency. We also find that fiscal transfer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uld induce the less-developed region to specialize, which means that fiscal transfer have both the functions of improving reg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Key Words: Interregional Specialization, Duplicative Industries, Increasing Return, Fiscal Transfer

JEL Classification: O180, R110

(责任编辑:黎 明)(校对:晓 鸥)